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学术著作

# 重庆抗战史： 1931—1945

主编◎周勇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学术著作

# 重庆抗战史： 1931—1945

主    编：周  勇  
副  主  编：陈  全  张鲁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庆抗战史:1931—1945 / 周勇主编.—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229-06739-7

I. ①重… II. ①周… III. 抗日战争史—重庆市—  
1931—1945 IV. ①K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7413 号

## 重庆抗战史:1931—1945

CHONGQING KANGZHANSHI: 1931—1945

主编 周 勇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曾海龙 林 郁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陈 永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40mm×1030mm 1/16 印张:28.5 字数:490 千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6739-7

定价:5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 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川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建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德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斯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汉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贵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世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庭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重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金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钺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傅 高 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 贤 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 本 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 笙 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 心 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 宗 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 宏 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 畏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曾维伦

##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记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



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够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 序 言

邢元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所进行的正义战争。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主张倡导并推动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各界同胞和抗日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经过八年艰苦卓绝斗争,在世界人民和反法西斯力量的援助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引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光辉旗帜。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世界各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设立重庆,重庆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后,重庆又成为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重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按照市委的部署要求,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广泛征集史料、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

编写了《重庆抗战历史:1931—1945》一书。这部著作全面反映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经过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为止的重庆抗战历史。全书着重围绕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重庆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并高举的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重庆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中心,承接了中国生产力布局的重大调整,构筑了战时中国的经济基础,支撑了抗战危局;重庆作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创造了一系列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座高峰;南方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雾都重庆的明灯,铸就了红岩精神,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本书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重庆抗战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阐明了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揭示了抗战对重庆的深远影响,颂扬了重庆人民不屈的抗战精神。

与此前的同类著作相比,《重庆抗战史:1931—1945》的特点在于:第一,比较好地把握了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的关系,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重庆发展的历史全过程,既充分反映了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重庆人民进行的全民抗战,又第一次全面反映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独立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斗争。第二,比较好地把握了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进行的全民抗战与国民党当局抗战的关系,全书充分反映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英雄业绩,客观展示各种爱国力量在抗战大后方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比较好地把握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系,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重庆人民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从而证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彰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巨大历史影响和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

《重庆抗战史:1931—1945》是研究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重庆地区历史的一部力作,是重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重要成果,是重庆学者献给这个伟大节日的礼物。这对于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着力

宣传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引导人们深刻认识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对实现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产生的巨大影响;着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重要历史贡献;着力宣传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功绩,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大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重庆抗战历史:1931—1945》的出版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我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重庆抗战历史研究,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局的高度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希望以此为契机,不断深化对重庆抗战历史的研究,充分利用重庆宝贵的抗战历史资源,资政育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弘扬红岩精神,把重庆的抗战历史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取得新的成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作出新贡献,为加快富民兴渝、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2005年8月15日

## 再版前言

周 勇

—

《重庆抗战史：1931—1945》已经出版八年了。

八年，这是一场抗日战争的时间。这部著作和它承载的重庆历史一样，又经受了八年的考验。

《重庆抗战史：1931—1945》出版以后的积极反映是预料中的。但是，也有一些是预料之外的。

——出版四年以后，2009年9月，“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研讨会在重庆举行。我以此书为基础，撰成《重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一文提交会议。西方学者认为，这篇论文观点准确，符合历史事实，代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积极的方向——越来越实事求是，同时也为抗战大后方研究指明了方向，开拓了广大的空间，这一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还有的称之为中国大陆抗战历史研究“思想解放的成果”，是第一次对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在重庆历史的正面肯定。我告诉他们，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来自于我的《重庆抗战史：1931—1945》，已经提出几年了，这次并没有增加什么新东西。可能是由于中国学界与西方主流学界交流太少的缘故，他们感到其中的“新意”吧。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

义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研究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田辰雄名誉教授于2000年共同发起的,为这一领域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对话平台。作为国际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项目和著名学术会议,也由于参加这一项目研究的专家都是在国际学术界、各国政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因此,“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会议产生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共识也越来越影响到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国际性学术盛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很久以来,国际学术界就期望在中国重庆召开一次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远的要说到1995年那次流产了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近的则是2003年,石岛纪之教授在东京主持的“重庆国民政府国际学术讨论会”。这项研究是1995年开始实施的“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由日本前总理大臣村山富士主持的“日中和平友好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本次国际研讨会由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东京)主办,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历史研究评议委员会协办,目的在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阐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之历史作用,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加强日本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日本学者,从中国请了三位,分别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一位是刘维开教授,他曾经担任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总干事,是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资深学者,时任台湾“中央”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一位是郑惠欣,曾供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一位研究民国时期经济史的资深学者,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还有一位就是我。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对国民参政会资料及研究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当时我在重庆行政学院(重庆市委党校)常务副院长任上。会议期间,石岛多次向我提出,希望在重庆开一次这样的会。我们三位中国学者凑在一起聊天,他们二位也向中我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当时我就暗下决心,尽力促成此事。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国际研讨会此前已经开过三次:第一次于2002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主题是“战时的中国地区问题”;第二次于2004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主题是“战时的军事战役”;第三次于2006年在日本箱

根召开,主题是“战时的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对于将要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专家们一致提议应该在中国举行。我抓住这个契机提出了在重庆召开的申请。由于重庆的特殊地位,更由于2005年以来中国学者,以及重庆在抗日战争研究方面的卓越表现,这个愿望终于实现。2009年9月7日至10日,以“战时国际关系”为主题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在中国重庆召开。会议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和西南大学主办,(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和我们的“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等协办。我在作学术报告前讲了一段话,“我们曾经为研究中国抗战历史而相聚于南京、东京,那时就有不少中外学者提出,希望在中国、在重庆,召开一次以中国抗日战争为主题的国际性研讨会。今天,经过中外学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得以相聚于中国的重庆,召开‘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研讨会’,我们大家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2010年,那一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与中国国民党党史馆2009年8月签署的渝台两地抗战历史文化研究合作备忘录的精神,举办的第一项学术活动。会议由西南大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旨在为中国抗战史研究开辟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展示研究成果、推动文化交流、寻求两岸共识、增进历史认同、促进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方面,为海峡两岸学者搭建一个新的对话平台。由于这次会议是海峡两岸学术界对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的第一次专题研讨,更是两岸学者第一次同场研讨,我向与会的台湾学者全面介绍了重庆抗战工程,再次将《重庆抗战史:1931—1945》中的核心观点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得到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先生为代表的台湾学术界的积极回应,大家求同存异、辩难求真,会议成为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的一次大胆创新和有益尝试。

——2011年4月,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受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发展促进委员会主席陈香梅女士之托,专程前来重庆,寻求联合全球华人在重庆建设大浩劫纪念馆方面的支持。他告诉我,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生前特意嘱咐他,一定要拜访我这位《重庆抗战史:1931—1945》作者。唐德刚认为,《重庆抗战史:1931—1945》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扎实的史料基础和



严谨的学术态度,使其成为中国大陆关于抗战大后方历史的代表性著作。所以他特别提议,将此书在海外翻译出版,以提高西方学界对中国大陆学界研究成果的知晓程度。

——2012年9月,我率“重庆抗战大后方海外档案史料考察团”访问美国。我们访问了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等一批史料收藏单位,搜集了一批抗战大后方档案史料。尤其是得到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关心和支持,大使馆政务参赞查立友先生专门听取了汇报,对考察团在美考察给予指导,作出精心安排,并陪同我们在华盛顿考察访问。他认为,中美联合抗日是中美两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源和感情记忆,研究重庆抗战历史,对于胡锦涛同志当年提出的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应该成为国家行为,服务中国的总体外交。他特别提出,应该将《重庆抗战史:1931—1945》在美国翻译出版,并表示,中国驻美大使馆将在资料搜集、协调举办研讨会和展览、联系在美出版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英文著作、加强与美国民间社团联系、促进重庆与美国友好城市之间的交流,尤其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等方面全力支持重庆。其间,查参赞特别陪同我拜访了陈香梅先生,我向她赠送了《重庆抗战史:1931—1945》,得到她的赞赏和首肯,并就抗战历史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和她交换了意见。她表示,抗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将全力支持重庆抗战史研究工作。

这些超乎预料,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对我们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 二

对于这本书而言,这八年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实施“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简称“重庆抗战工程”)。我非常有幸,参与了这项重庆市委全委会决定实施的重庆历史上第一项重大历史文化工程的调研、论证、决策、实施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重庆抗战史:1931—1945》为“重庆抗战工程”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大后方人民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抗战历史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更是重庆和

中国西部地区最重要、发展现状最薄弱、抢救保护最紧迫的历史文化资源。

多年以来,社会各界,尤其是各民主党派、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对加强抗战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提出了大量的提案和建议。海内外同胞和各国友人也对此项工作寄予期望。

重庆市委、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直辖以来,按照中央的部署,重庆市对大后方抗战历史研究和抗战遗址、文献的抢救保护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9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sup>①</sup>的指导方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要求“坚持正确方向,拓宽研究领域,改进研究方法,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研究的水平”<sup>②</sup>,从而为抗战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重庆市委提出了“开发传承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总体要求,并于2009年6月召开三届五次全委会,决定“加强重庆优势历史文化资源研究,精心组织实施‘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推出一批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sup>③</sup>。这一决策得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国务委员刘延东等中央领导的首肯,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化部及文物总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2010年5月,重庆市委颁布了《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规划纲要(2008—2015)》,标志着“重庆抗战工程”正式启动。2012年,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又进一步提出了“实施特色文化培育工程,加强对抗战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的新要求,为继续推进“重庆抗战工程”增添了新的动力。

重庆市委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点。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抗日民族统

①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4日。

②李长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5日。

③《中共重庆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重庆日报》2009年6月30日。